

# 〈馬克思主義在西方— 從新馬轉向後馬的理論變貌〉

洪鑣德\*

- 一、前言
- 二、導致後馬產生的背景與因由
- 三、拉克勞與穆佛的符號學馬克思主義
- 四、解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
- 五、哈伯馬斯、紀登士和卜地峨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
- 六、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與文化批判
- 七、結論

本篇論文係討論近半個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歐美發展、演變之情況，尤其追蹤西方學界中馬克思主義如何由西方馬克思主義（西馬）、演進為新馬克思主義（新馬）、乃至於化為近期的後馬克思主義（後馬）之心路歷程。在說明後馬崛起的歷史背景和思想脈絡之後，接著介紹標誌「言說」的重要性之符號學的馬克思主義（也即後馬）。其代表人物為拉克勞和穆佛。進一步本論文處理影響當代西方思潮的解析學派之馬克思主義，以及賴特的階級剖析理論。此外，當代德、英、法三位傑出的社會哲學家——哈伯馬斯、紀登士和卜地峨——對馬克思主義之批判，以及對歷史唯物論之重建，值得吾人矚目，故特加述評。最後在檢討後現代主義和詹明信的文化批判之後，作者指出當代西方盛行的馬克思主義的特徵，及其所產生的作用，顯示馬克思主義堅韌的生命力並未因蘇東波變天而趨向衰微。

**關鍵詞彙：**西馬、新馬、後馬、符號學馬克思主義、解析的馬克思主義、當代社會科學

---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教授

## 一、前 言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馬克思主義經歷了鉅大的變化。一方面由於前蘇聯在與美英法聯手打敗納粹第三帝國之後，居然躍升為世界的新霸權，領導著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以美英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全球分裂為東西陣營相互抗爭之冷戰時代，以蘇聯與中共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奉馬列主義為正朔，提昇它為國家發展與建設的指導原則，更將其作為執政的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以及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之來源。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東歐、中國、朝鮮、越南與古巴成為官方的馬克思主義（official Marxism），也即正統的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這種以共黨和國家的力量所推行的官方意識形態，在東歐形成了「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在蘇聯則演變為史達林主義、赫魯雪夫主義、布里茲涅夫主義等等教條式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則發展為毛澤東思想，後者甚至被視為馬列主義在東方成功的發展與落實。<sup>1</sup>

另一方面，在歐陸與英美馬克思主義也經歷了幾個發展的階段。第一階段是以批判史達林暴政、興起于法國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以沙特為代表），和現象學的馬克思主義（以梅樓·蓬第為代表），這大概是1950至1960年代初的情況。第二階段則為1960年代初巴黎爆發的五月學潮（「五月風暴」）和英、美、德、日各國的學運所凸顯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與反抗的精神，這個介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學說，包括了阿圖舍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馬孤哲為首的法蘭克福學派之批判理論，以及賴希為主的佛洛伊德的馬克思主義等等。

在歐陸與英美，1960年代初與1970年代中期，可謂為結構主義聲勢最盛的時期，但在1970年中期之後，隨著朴蘭查後結構主義的崛起，在西方社會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有了新的轉折。這標誌著新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作為馬克思主義核心的唯物史觀面臨嚴峻的挑戰。馬克思所期待的人類解放之實行者或稱行動者（agency），也逐漸由傳統的普勞階級轉變為不確定的群

<sup>1</sup> 關於馬克思主義在東歐的發展，作者已撰成〈馬克思主義在東歐——新馬與馬列主義的對抗〉一文，參考洪謙德1995e。

體（白領階級、中產階級、學生團體等）。<sup>2</sup>

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歐美的馬克思主義又有了新的變化，這可謂是它戰後發展的第四階段；這一階段可視為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以下簡稱後馬）的開端。所謂的後馬克思主義，就是向馬克思主義告別，不再以馬克思的理論為綱領，甚至放棄馬克思的教誨，而仍舊追求人類解放的新理想與新策略，其代表人物為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穆佛（Chantal Mouffe），是即符號學的馬克思主義（Semiotic Marxism）的出現。

本文重點在於評析上述第四階段，也即1985年以來符號學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情況<sup>3</sup>，以及與此相關幾種後馬新理論，包括柯亨（G. A. Cohen）、羅默（John Roemer）和艾爾士特（Jon Elster）解析性的馬克思主義；賴特（Erik Olin Wright）經驗取向的階級分析理論；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紀登士（Anthony Giddens）和卜地峨（Pierre Bourdieu）對唯物史觀的重建。此外也討論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布德希拉（Jean Baudrillard）、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最後則評述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等理論。

## 二、導致後馬產生的背景與因由

導致後馬理論的崛起之因素，包括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劇烈的改變、知識界本身的變化、理論的轉折與更新等等（Ritzer & Schubert, 363-369）。

### 一、全球政經社會劇變

在全球的政經變化中，無過于前蘇聯戈巴契夫上台後所推動的「新思維」和「改造」（perestroika）所促成的東歐與蘇聯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整個蘇東波的變天，不但造成蘇聯集團的崩潰，也解除了戰後延長三十多年的東西對抗，使冷戰徹底消失。

<sup>2</sup> Das Proletariat過去譯為普羅階級已由作者改譯為普勞階級，取其普遍勞動之意，以別於普羅汽車、普羅塗料、普羅牙醫等之professional的音譯，參考洪謙德與黃德怡1994：3,1。

<sup>3</sup> 關於符號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成與演變，請參考洪謙德1995c。

隨著蘇聯紅色帝國的解體，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也出現雷根與布希、以及余徹爾與梅傑的新保守主義之政府。同時米特朗總統也推行了由左轉右的政策。在整個西方經濟流于不景氣的情形下，美國同日本，以及同西歐的貿易戰遂告展開，全球的貿易有陷於區域化，集團化的趨勢。與此同時發生的則為：在政府與工會的介入下，普勞階級逐漸改善其收入與工作條件，提高其工資與生活水平，從而西方社會中的工人更不思團結奮鬥，更不想加入暴力革命來推動人類解放的事業。

上述東西方的政經、社會變化使新馬的理論變成落伍與脫離現實，在喪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之同時，霍布士邦（Eric Hobsbawm）遂指出：「我們當中有人相信十月革命是通往未來世界史的門檻，這種盲目的想法證明是錯誤的。當前全世界幾乎沒有任何地方所推行的制度表示可以取代資本主義」（Hobsbawm, 21）。這種情勢的改變也造成法、義、西、葡等國的歐洲共產主義（歐共）之沒落。歐共的理論與實踐本身是殘留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唯一可以展示其優越性的最後橋頭堡。如今卻隨著信奉歐共理念的法、義、西、葡等國共產黨的紛紛失勢，馬克思主義在西歐完全喪失其形成政策、改變政治的機會。剩下來只有倚賴學院派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或是活躍在文化界、新聞界有限的新左派發揮他們的理論想像，去改造和更新馬克思及其繼承人的創思與理念。但這種新理念的形塑只有造成理論與實踐之距離愈來愈遠，終於達致理論與實踐的落差。

## 二、知識界的演變

不僅政經的劇變，導致新馬理論轉變成後馬的學說，就是過去十年來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變化，也使新馬理論面臨嚴峻的挑戰。在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包括新的麥卡錫右派思想的復辟；英美流浪街頭、到處遊蕩的社會邊緣人現象的式微；大學與高等學府的擴大；激進知識分子被大量僱用和收編；知識分子的學院化、庸俗化、馴服化（消失激烈或極端的言行）。凡此種種情況都使新馬的理論布爾喬亞化。

賈可比（Russell Jacoby）遂指出新馬理論家一旦進入學院，在面臨「不出版就完蛋」的威脅下，拼命研究、閱讀、寫作、出版，於是

他們的學識愈來愈像是他們的著作所企圖要推翻的事物。在過去25

年當中最令人驚奇的無過於新左派教授的出現與消失。總結事實，並非新左派的知識分子侵入校園；而剛好相反，卻是學院的自由概念和關懷佔據、或稱最終盤桓在知識分子的心靈中（Jacoby, 1987:141）。<sup>4</sup>

與知識界演變息息相關的是西馬與新馬的理論大師紛紛謝世（阿朶諾1969；盧卡奇1971；霍克海默1973；馬孤哲1979；古德涅1980），特別是影響重大的結構主義學派，隨著奠立者阿圖舍謀殺其妻身陷囹圄之後，整個學派幾乎崩解，阿氏也於1990年逝世。早期同阿氏過從甚密才氣縱橫的希臘理論家，也即後結構主義之代表人物朴蘭查卻在盛年（42歲）的1979年自殺身亡，造成其理論的懸空，也導致後繼無人。

缺乏理論大師的繼續經營，不僅是結構主義，就是後結構主義，都暴露了理論的淺薄、涵蓋面不夠周全、無法與時勢共推移等等毛病。為了使後馬克思主義者、或告別馬克思主義者（ex-Marxists）有新的知識源泉、新的理論取向，鍾士（Gareth Stedman Jones）遂指出：「馬克思〔的學說〕只是許多社會主義思想賴以取用的源泉之一。現在應該是左派放棄堅持馬克思主義當作理論與信條無法分開的唯一統一體底時候」（Jones, 3）。

### 三、理論的更新與綜合

不屬於新馬陣營，也不屬於新左派的當代思想家中，像卜地峨、哈伯馬斯、紀登士企圖綜合與復活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等古典理論大師的觀點，而影響了新馬的理論取向。特別是後古典主義和文化社會學，不再重視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唯物主義。他們配合著語言結構分析，而注重上層建築，或意識形態的評析，這對後馬理論的衝擊極為重大。

換言之，西方學院派和主流派的理論者，把馬克思解釋為功能主義的思想家，而非獨特的辯證論者。向來人們視馬克思有異於西方傳統的地方，為其使用是然與應然可以合而為一的辯證方法，也即抹煞事實與價值的分辨之特殊洞見，更是一種討論人類未來的解放與終極關懷之「大敘述」（Grand narrative）。可是解析的馬克思主義卻一反這種說法，無論是柯亨，還是羅默、還是艾爾士特都強調以西方傳統的經驗研究方法來解釋馬克思的學說，從而與主流派的說法無多大不同，而使馬克思的學說更符合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至少其研究方法不再受資產階級學院派的排斥。

<sup>4</sup> 也參考洪謙德1988: 49-52。

至於所謂後現代主義的學人更排斥馬克思主義或新馬中大而無當、空泛不實的理論，也即拒斥「大敘述」。他們同後馬理論家相似，採取細緻的、精巧的、事實的分析，甚至把博奕論（game theory）、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也引進新馬、或後馬的理論營構之上，艾爾士特還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供「微觀的基礎」（micro foundations）。

後馬理論的特色變成不尚空談，不談全人類的徹底解放，而強調各區域、各國度、各地方色彩、各群體的多種不同之利益，也即強調多元主義的民主，認為自由主義的民主，或基進的民主（radical democracy）為增進大多數人最大利益的方法。由是顯示後馬的理論與實踐無法完全統一的事實。

### 三、拉克勞與穆佛的符號學馬克思主義

#### 一、符號馬克思主義的崛起

在眾多的後馬理論當中，以拉克勞和穆佛的學說最為新穎，也引起最多的爭議<sup>5</sup>。兩人在1985年出版了《霸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一書，不再像馬克思一樣強調社會的物質基礎——生產力突破生產關係帶動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階級形構的變動——決定了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反之，由於受到語言分析的影響，兩位後馬克思主義者指稱在後現代的今天，社會與經濟形構（social-economic formation）早已溶化為言說的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

換言之，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認為「拉克勞和穆佛的主張是指出世上並沒有物質利益之類的東西，而只有透過言說構成的有關物質利益之理念而已」（E. M. Wood, 61）。兩氏除了以理念取代物質利益，也把馬克思主義核心的普勞階級之歷史使命與改造世界的特殊角色一筆勾銷。也就是說拉氏與穆氏是屬於一個運動的部份，企圖把社會主義實現的計畫不是建立在階級的敵峙與階級的鬥爭之上。這也就是伍德所指摘的新而「真實」的社會主義（a New “ True ” Socialism），這種新社會主義無非是偽裝的自由主義，究其實際卻是由「階級中撤退」，不再言及階級，特別是普勞階級扮演的革命角色。易言之，企圖以自由主義來取代馬克思主義（E. M. Wood, 47-75; 140-145）。

<sup>5</sup> 參考本文作者近著洪謙德1995a與1995c。

明顯地，兩氏把階級的問題溶解為主觀的與言說的概念。他們認為，社會界不再分裂為針峰相對的兩個階級，反之到處充滿各種各樣的敵對、衝突、鬥爭。其原因是由於人人都佔據了社會上各種各類的地位底緣故。既然社會的地位複雜、利害互異，根本沒有可能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的階級之可能。馬克思認為階級和階級意識可以導致階級的團結與覺醒。這種說法在拉氏和穆氏的眼中是無從落實的，原因是階級缺乏了「統一的言說」(unified discourse)。對兩氏而言普勞階級普遍廣泛的團結之聲已被「眾多的雜音」(polyphony of voices)所取代，每個聲音都建構成無法再化約的言說認同體(discursive identity)(Laclau & Mouffe, 191)。

## 二、基進的民主之鼓吹

根據兩氏的說法，當代馬克思主義者不該再把焦點老放在普勞階級單一的問題之上。反之，應該關懷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弱勢團體與個人，像女人、黑人、環境保護運動者、移民、消費大眾之類。這種說法的結果，使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喪失了中心(de-centered)，也去了掉總體性(de-totalized)，這是由於不再把焦點擺在普勞階級之上，不再視普勞的問題為全社會的問題之緣故。

既然把普勞階級一腳踢開，拉氏和穆氏便不再視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普勞階級，乃至整個人類的解放。取代人類解放的理念，便是推動「基進的民主」。有異於右派民主理論者強調個人的權利，兩氏主張「創造一個新的霸權活動，這是最大量的民主鬥爭之結果」(Mouffe, 1988:41)。所謂霸權活動，應是涉及民主的價值之活動，也就是使民主的實踐多重化，在社會各種各樣的關係中讓民主的實踐廣化與深化，而成為制度的一環。

基進的民主企圖把各種各樣的民主鬥爭，包括反對種族歧視與迫害、反對性別歧視與差別待遇、反對資本家的剝削與迫害、反對汙染與破壞自然，這林林總總的鬥爭，都可以視為基進民主的鬥爭，應鼓舞各種族群、團體與個人積極參與。拉氏與穆氏所要追求的是各種各樣的鬥爭，每個或大或小的民主鬥爭都具有相等的價值，其最終目標在建立「基進的與多元的民主」(Laclau, 1990:27)。拉氏與穆氏總結其主張

左派另一個選擇的機會為全心全意獻身于民主革命，並擴大各種反

抗壓迫的不同鬥爭之平等聯繫。因之，左派的使命不當譴責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反之，應該擴大它、深化它，使其走向一個基進的與多元的民主道上……它不是對民主陣地的放棄。剛好相反，是把民主鬥爭擴散到民間社會之上，也擴大至國家，也即讓左派稱霸的策略有發揮作用的可能（Laclau & Mouffe, 176）。

儘管基進的民主最終仍舊致力於取消資本主義，但它認為資本主義的取消並不意味人類不平等的剷除。要剷除人間的不平，非藉更多的力量，特別是個人的理性的、寰宇的政治不為功，這不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能想像的。

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之輪迴》一書中，穆佛開宗明義便指出蘇東波共產主義的崩潰，只有造成民族主義的再度囂張和地方衝突的加劇；取代世界新秩序的是種族、宗教、族群的更大鬥爭，西方世界企圖推出的普泛價值，居然遭到各地方個別利益的挑戰與戳破。

### 三、政治的再現與民主言說

各種爭執、敵對、抗爭都與權力的追求有關，也即涉及政治的事物（the political）。因之，躲避政治，只會損害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不過政治的事物並非僅存在於社會某一制度，或某一範圍裡頭，而是凡有社會之處，便有政治事物的存在，這與社會必然有內在與外在的衝突，而解決衝突只有靠政治的策略之運用，是同一道理的。既然社會的內外都有爭執與敵對的存在，吾人應視爭執為人類無可避免的宿命。唯一不同于自由主義者的言行，後馬的理論家主張，人們不要把人我與敵友的關係看得那樣分明。在一個多元民主的秩序中，不妨把敵人看作是對手，這樣就不致非置他于死地不可，大家便有公平競爭與共榮互動的機會（Mouffe, 1993:4）。

同拉氏與穆氏主張相當接近的有包樂士（Samuel Bowles）與金提士（Herbert Gintis）對現代資本主義和民主的批評，他們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應該拋棄與遠離經濟危機的論述。經濟的危機固然與階級敵對和衝突有關，但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個人的權利（例如福利和公民權）與財產權利之間的矛盾。197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個人權利擴大的結果，造成利潤的縮小與經濟的緊縮，也促成右派動員各種力量去奪回資本家的失土，這就是何以新保守主義得在英美復辟的主因。由於馬克思的理論對民主與人權的



忽視，以致對當代的新社會運動無法介入，也無從解決美國社會的種種矛盾。他們效法社會科學中語言分析的研究方法，集中在「言說」(discourses)之上，指出對言說的抗爭使集體的行動者得以崛起。就像槍砲與麵包一樣，言說也是社會力量的一種，自具特性(Bowles & Gintis, 155)。人們所當努力者為創造一個嶄新的、後自由主義、後馬克思主義之民主言說。靠著這種嶄新的民主言說，人們可望走向後自由主義的、基進的民主理想。在這種新民主社會裡，經濟是可以估量與負責的、教育是公平開放的，至於社區與家庭也可以協和共榮。總之，民主而負責的各種制度，使包氏與金氏的主張成為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混合，也是後馬重要的理論之一。

## 四、解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

### 一、解析的馬克思主義

採用當代先進的哲學與社會科學之方法學(methodology)，特別是「使二十世紀的解析哲學具有特色之清晰與嚴謹之標準」(Cohen, 1978: ix)，去重新改變與詮釋馬克思及其隨從者有關社會的論述，便得到解析的馬克思主義。不過解析的馬克思主義並非特重方法、特重研究的工具，而是強調細節的文體(style)，和解釋的清晰，以及論證的嚴謹，使它與其他流派的馬克思主義有別(Ware, 4)。有異於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析的馬克思主義否認馬克思的學說有其獨特的方法。後者最關心的是馬克思的論調，是否與現代學術界公認的方法學和模型之嚴格要求相吻合。<sup>6</sup>

解析的馬克思主義可以回溯到本世紀初Egon Bohm-Bawerk與Rudolph Hilferding有關勞動價值與生產價格的爭論。不過構成新馬乃至後馬的解析的馬克思主義則崛起於1970年代。當時幾位哲學家有系統地藉解析哲學來探討歷史唯物論。其中以吳德(Allen W. Wood)和柯亨最享盛名。兩位理論家把歷史唯物論解釋為生產力的改變如何導致生產關係的改變之理論。他們聲稱，作為馬克思思想核心的理論為歷史理論。此一理論只有在堅實的論據下、嚴格的定義下、連貫的邏輯推衍下，才能產生解釋的效果。

<sup>6</sup> 以下參考Gary A. Dymiski之文章。

對柯亨而言，生產的社會關係之層次上，馬克思的解析可以有效捕捉現象，只有當這些關係與生產力相符合，也即不致有鑿柄難容時，才成爲可能。換言之，只有當生產關係作爲生產力的功能之一時，生產力的變動才會導致生產關係的改變。詳言之，柯亨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引申爲兩項重要的論題，其一爲首要論題（Primacy Thesis），生產力是解釋大規模社會變遷的首要因素（Cohen, 1978: 134-180）；其二爲發展論題（Development Thesis），在歷史上發展而成的生產力會造成不富生產性的社會結構被較富生產性的社會結構所取代（Cohen, 1978: 25-27; 55-57）。對吳德而言，馬克思的理論必須接受一個理念，即生產力對生產關係是賦予一層束縛的。在上述功能性馬克思主義解析上，個人的行爲與動機完全不發生任何的作用（A. Wood, 1972）。

到了1980年代，多位新馬的社會學家重新引發對解析的馬克思主義之研究興趣。他們把主流派經濟學說中的新古典主義之數理模型應用在馬克思的論述之上，這包括博奕論、適當理論（optimization theory）、和一般均衡理論。可是這些方法論都涉及個人的經驗與解釋，也即對任何社會現象的解釋離不開設定目標與追求目標的個人，以及個人如何自由自在地去選取達致該目標之手段。

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提供「微觀的基礎」之艾爾士特，便以個人的觀點徹底地探究了馬克思的方法論。有異於吳德和柯亨的功能說（把個人視爲受到結構的限制），他堅稱集體的行動乃爲個人行動之累積。在這種說詞下，當作行爲主體（單位）的階級，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並無助力，是故階級的問題也就顯得微不足道（Elster, 1985, 1986）。

另一位新馬理論家羅默的著作也在此時引起相當的震撼（Roemer, 1982, 1988），他堅持馬克思的主張如果要被視爲普遍的、一般的理論，只有當這些主張符合華爾拉斯（Leon Walras）一般均衡的理論時，才有可能。原來經濟學家華爾拉斯認爲均衡是一種人造的、人爲的、設定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分配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率，因爲活動者（agents）在擁有完整的資訊下可以作出毫無拘束、毫無限制的自由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交易都不用花費，也可以事先規劃協調，以致供給與需求完全相等。羅默說這種的均衡代表著馬克思經濟理論中資本主義最純粹的形式。

羅默證明當擁有不同生產資財的活動者，在華爾拉斯均衡的情況下進行活

動（互動）時，那麼馬克思所預言的各類特徵（features）便一一浮現。這些特徵包括「基本的馬克思論旨」（Fundamental Marxist Theorem），剝削現象和階級的崛起。只要原始的生產資財存在的話，所有活動者之行爲乃是由活動者爭取最大利益產生出來的。可是當原始的不同生產資財之擁有（differential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assets）一旦消失，而所有的活動者又追求其最大利益時，那麼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特徵也告失蹤。羅默遂下達結論，指出馬克思的理論基本上之關懷爲社會的不平等（原始的生產資產不同的擁有），這種不平等表現在誰擁有何物，誰在替誰勞動之上（Roemer, 1982）。

羅默在1988年的著作《無代價的喪失》一書中，強調不同生產資財的擁有，才是馬克思解析的經濟理論底核心，而非傳統上所言的剝削理論。假使所有活動者並不追求最大的收入，那麼一個異例便會出現，那就是有可能富人受僱於窮人。在這種情形以剝削作爲判斷社會公平與否便非適當，只有靠不同的生產資財之擁有，才足以說明窮人永遠居于不利的地位，也即社會公道無法彰顯的因由（Roemer, 1988）。

柯亨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解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異於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之處，爲關心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蓋前者對社會不公不平極爲措意之故。他本人已由關心生產力、生產關係轉變到道德問題、政治問題之上。這種轉變肇因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劇烈變遷。顯然這種劇變，使新馬的學者必須重視規範的問題（normative problems），這些問題過去幾年間幾乎不存在，也不具政治重要性（Cohen, 1990: 363-364）。由是可知專搞微觀基礎的、經驗性的、解析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轉變爲討論規範性道德問題與政治問題的趨勢。

## 二、賴特的階級解析與馬克思主義新詮釋

與解析的馬克思主義同樣強調微觀的基礎和經驗的取向，又採用數理模型的研究法，便是賴特有關階級的剖析。<sup>7</sup>

在其處女作《階級、危機與國家》（1978）一書的開端，賴特認爲新馬理論家有必要發展一套經驗性研究方法，既深植于馬克思的範疇中，也符合馬克

<sup>7</sup> 賴特曾於1995年3月底4月初抵台參加南港中研院民族所有關台灣社會階級分析研討會，也到台大法學院社會學系舉辦有關重建馬克思主義的座談。其觀點新穎、分析精闢、言論幽默、令人折服。

思理論的邏輯（p.10）。此種新的方法可以對抗美英主流派的實証主義之方法。後者視理論的建構不過是規則性的事物如何形成規律的經驗性概括化而已。馬克思的認知論之特色為社會表象與潛在于表象之下社會實相這兩者的分辨。這種分辨不在看輕表象，而是為表象尋找解釋的基礎（pp.11-12）。應用阿圖舍的「泛層決定」（over-determination）和結構性的因果關係，賴特發展六種「決定模式」（modes of determination），也即在馬克思理論的結構範疇中尋找其決定關係（p.15）。

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裡中產階級的崛起，新馬理論家不能不為中產階級做定性與定位的分析，有人或視中產階級在階級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其存在是一種幻象；有人視中產階級只是遊走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社會階層，它有時稱為小資產階級；有時稱為新工人階級；又有人認為中產階級為真實的階級；同資產階級和普勞階級有別，也即新階級；最後又有人認為中產階級只是一大堆地位的綜合，隨每人處境的不同，分別佔據對峙的兩極階級之任何一方，可是，賴特引申羅默有關剝削理論，配合美國與瑞典的資訊，而對所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結構，特別是中產階級，提出客觀的，令人信服的分析（Wright 1989:3-43）。

在與兩位同僚合寫的新著《重建馬克思主義》（1992）一書中，賴特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一座古舊的建築，可以翻新、可以修葺，俾成為人類了解社會界、甚至改善社會界的希望之所寄（p. ix）。其實此書主要目標仍在檢討馬克思與新馬理論家（像柯亨、紀登士）有關歷史唯物論的看法（Wright et. al., 1992）。

在1994年出版的《審問人間的不平》一文集中，賴特自敘生平，認為自己是掉入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陷阱」中，但卻無怨無悔地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平生知識追求的志業（pp.4-11）。他不認為自己的作品只是認識或引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反之，卻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作出貢獻，也即有意重建、或改造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這本文集的前言中，他對「後馬」一詞有他亦莊亦諧的看法，這是指1980年代知識界與馬克思主義傳統離異（divorces）的層出不窮。它有異1950年代的拋棄馬克思主義（ex-Marxism），蓋後者不僅拋棄馬克思主義，有時甚至出賣（betrayal）馬克思主義而投入資本主義的懷抱中（Wright, 1994:12）。

## 五、哈伯馬斯、紀登士和卜地峨對歷史唯物論的重建

當代非馬派的學人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傳統，最能夠掌握，又最能夠加以批判地接受，進一步還重新以馬克思的精神來解釋瞬息萬變的當代世界之學人，大概得推德國的哈伯馬斯，英國的紀登士和法國的卜地峨。現簡述他們三位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評論和重建。

### 一、哈伯馬斯重建唯物史觀

由於當代國家對經濟所扮演的干涉者之角色，使得上下層建築的分別，變成愈來愈不重要。可是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價值理論卻建立在上下層建築的關係之上，由是哈伯馬斯遂認為馬克思無法掌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特徵。爲了更好理解當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有必要另尋理論途徑，可是新理論的產生卻受到馬克思歷史唯物論某些觀點的阻礙。

根據哈伯馬斯的分析，歷史的進步有兩種表現的方式：技術上的合理化和實踐的合理化。前者在於社會有能力控制自然演變的過程；後者則爲對人類彼此互動所產生的規範能夠合理化、正當化。

換言之，馬克思的社會實踐包含了人類的勞動與互動，將人類的互動化約爲勞動是不對的，正像把人類的進步只歸因於科技的進步是同樣的荒謬（Habermas, 1971:53）。這種錯誤是由於馬克思把社會實踐的理論視同自然科學的理論來看待所引發的。

哈伯馬斯遂認為馬克思在分析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誤把實踐的合理化（有關人際的互動之合理性）化約爲技術的合理化（Habermas, 1971:53）。由於馬克思把互動化約爲勞動，導致他的歷史唯物論與政治經濟的鑿柄不容。爲此在重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之時，哈伯馬斯認為有把互動同勞動等量齊觀的必要。

### 二、紀登士對唯物史觀之批評

紀登士企圖把傳統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學說折衷，並且結合在一起，因爲他不認為「在馬克思主義與布爾喬亞的理論之間存在著明

確的分界線」底緣故（Giddens, 1979:1）。

首先，他認為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看作是一種結構的和階級關係造成的社會經濟制度，這是正確的。原因是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會靠著把勞動力當成商品來出賣，也靠著出賣勞動力來吸收物質的剩餘，從而造成社會的分工，形成階級的社會。要理解當代勞資的階級關係與階級鬥爭，勢須首先了解生產力的特殊活力。而生產力之主體乃為勞動群眾。作為人與階級的活動角色，勞動群體進行了社會實踐（praxis）。在實踐中人不但意識到本身的處境，也會產生改變處境的決心和培養改善環境的能力，從而衝破周遭的束縛。這些都是紀登士讚賞馬克思之處（Giddens, 1981:2; 1984:242）。

但紀氏旋即批評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為演化論的老套，強調生產力的首要，把焦點擺在生產力之上，而逐漸不注意到人或社會活動體（human and social agency）。換言之，演化論是功能理論者，是目的論者。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淪落為功能論之一。所謂功能論是強調社會體系有其特定的需要、目標與功能，人們的勞作與活動是朝此一需要、目的與功能而為的。此種說法勢必減少了對活動者個別的動機、行動與奮鬥之重視。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指明至今為止人類的歷史演變之階段與軌跡，他也設定歷史發展的目標為共產主義的降臨。馬克思認為真正的歷史開始於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之後。對此紀氏認為是對過去與現在人類歷史（個別人、或社會群體人從事奮鬥）的忽視。為了矯正這種偏頗，紀氏主張歷史的發展沒有止境。

談到歷史的活動體或主體時，馬克思主義者所認定的只有無產階級。但紀氏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普勞階級（勞動階級、無產階級）才扮演歷史載體（主體）的角色，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封建社會）雖為階級分化的社會（class-divided society），但卻非階級社會（class society）。易言之，在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對自然的宰制」就是說明人擁有「分配的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但在階級分化的社會，人擁有的卻是「人對社會（人對別人）的宰制」，這是人的「權威性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紀氏認為馬克思唯物史觀另一個缺陷，就是給予「分配的資源」太多的優越性，以致忽視了「權威性資源」的作用。是故只有在資本主義時代，分配的資源才會比權威的資源更具優越，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情況則適得其反（Giddens, 1981:4）。

紀氏認為社會的力量，不全在階級，也不在階級的分裂、敵對、鬥爭中展現出來。換言之，除了階級之外，也應考慮族群、性別所造成的分別。事實上人類文明與歷史的發展不限於階級鬥爭，其他歷史上的暴力、戰爭、對現代文明的形成影響更為重大。

### 三、卜地峨論象徵性的資本

卜地峨在建構他有關「場域」(field)與「習性」(habitus)的理論時不惜與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決裂。<sup>8</sup>依他的看法現代的馬克思主義「更接近馬克思主義者，而疏遠了馬克思本人」。換言之，他認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有兩大缺陷：其一為把社會的場域化約為經濟的場域之「唯經濟主義」(economism)。其二為只重視社會結構，而忽視社會界中人們從事象徵性(語文)的爭鬥之「唯客體主義」(objectivism)。

對卜地峨而言，人的言行都是象徵性的表現，不管是人使用語文的精緻或粗魯、穿著的考究或隨便、生活型態的高雅與庸俗，都可以看成為人類象徵性的資本之應用。這種象徵性的資本雖源之于物質財貨的經濟資本，卻比經濟財更直接決定人們的社會生活(Bourdieu, 1977:183)。

換言之，象徵的諸種形式(語文、穿著、姿勢、生活樣態)對於智識與統治(宰制)都具關鍵性的重要，是造成社團能夠和諧運作和社會秩序得以維繫不墜的因由。古典的馬克思主義之傳統強調象徵體系的政治功能，而以統治階級的利益來解釋這些不同的象徵體系之間的變遷，也以統治階級的利益來解釋被統治階級如何受到錯誤的意識所宰制。但根據卜地峨的看法，這種講法是把權力關係簡化為溝通的關係。象徵體系真正的政治功能，只存在於把「正確」或「錯誤」的定義硬性加在社會界之上，因而使統治、或宰制獲得合法化。

換言之，對卜地峨而言，社會並不存在著什麼階級鬥爭，而只有象徵體系之間的鬥爭。也即象徵體系的鬥爭決定了社會界的觀點，由此衍生出社會空間，這種社會空間提供人們去營生，也提供人們，在教育、工作場所裡、社會的組織、或雅俗的品味裡展現出個人與他人之間從屬的關係。社會空間是各種不同生活樣態所形成的階層群體(地位群體)之活動空間。

<sup>8</sup> 參考本人有關卜地峨社會理論的析評，見洪謙德1995b。

從上面的簡述，可知卜地峨把馬克思所強調的經濟資本轉化成象徵資本，又以象徵體系的爭鬥來取代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這一改變便是他自稱其理論可以更貼切解釋當代工業社會之原因。

## 六、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與文化批判

### 一、後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理論是從法國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發展出來的，尤其是在馬克思派的結構主義崩盤之後，它佔據後者留下來的空間，而逐漸成為英美加澳紐等英語地區理論的寵兒。後現代主義者拒絕「大敘述」所涉及的主體（普勞階級）之理念，也拒斥歷史進步的觀點。他們採用一種激進的看法，企圖綜合真理與權力，這是繼承尼采對西方理性的批判底精神。

後現代主義者排斥當代科學認知論的假定（依據知識對經驗實相描述的深淺，來決定知識的好壞）。他們也拒斥古典的理性主義（知識可依其直覺到真理的標準來定其好壞高低）。他們對外在實相的描述，並非視這一描述與某一真理的標準相符合，而是把社會界看做一大堆敘述的累積，這些敘述聯繫到某一特定的權力的形式之上。換言之，主宰後現代主義者心靈的兩項概念為：多元主義和言說（discourse）。

後現代主義不僅批評了認知論，也批評伴隨著西方理性以俱來的一連串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例如福柯認為當代人對瘋狂、犯罪、病痛、性都在加強其宰制的程度，當代的服務業和救濟專業愈來愈展示業者的權力，從而迫使每個講究理性的人必須自我控制、自我收斂。在這種情形下，社會的規範和管理變成愈來愈擴大、愈來愈壓制。特別是當自我節制取代外部的監控與囚禁之時。西方理性頌揚真理的追求，西方「立意善良」的各種制度（例如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的措施）卻把知識和權力之關係遮蓋起來（Foucault, 1967, 1973, 1979, 1980a, 1980b）。

布德希拉也視歷史是朝社會控制的方向在邁進。這種控制的基礎仍舊是知識，也是受到資訊爆炸所造成的文化影響。他認為當代的生活受制於恐怖主義



式的符號系統，一個虛假的同步（simulation）過程，每日都在你我的身邊展開，這種同步過程也就是電視上所出現的虛假影像。它把實相加以掩蓋、偽裝、扭曲。

這些符號的權力使人們的歷史意識模糊，只剩下當下發生的種種切切。這些當下發生的事件幾乎彼此不生關連、毫無關係。像洪水沖激，也像水銀瀉地，當代的資訊、消息、影像、文字、符號等等把主體與客體的距離完全泯除。生活中各種層次、各個角落、各個氛圍之分辨也一掃而空。於是個人的社會經驗變成淺薄的、虛有其表的、庸俗的。在這個社會的大漩渦中我們只看到隨波逐流的「超級同形」（hyperconformity）。在這種情形下，「批判」也好、「革命」也好，都化約為機器人似的同步複製，這些批判與革命只是一大堆影像的複製品而已，它們加劇了生活的死氣沈沈與無聊（Baudrillard, 1975, 1981, 1983）。由是可知後現代主義是排斥理性的統制，同時迎接著自我解體（self-disintegration）的來臨。

同批判理論對啓蒙運動之批評相似，後現代主義在師承尼采對西方文明的攻擊之後，不認同人類解放的理想。這兩種學說都視人類的解放是權力、迫害和文化同質化（culture homogenization）之手段，他們不談道德改善的炎炎大言，也不談集體的策略，他們對現代社會的單面向與後現代性抱持極端的悲觀。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影響頗廣，包括對當代社會理論、政治學說、哲學、文藝批評、文化批評都有深刻的衝擊。

## 二、文化批判

詹明信的文學批判成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新標竿。原因是他企圖把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他曾經指摘後現代主義者喧囂而混亂的過度膨脹，破壞了對環境的認知，也縮短了批評的距離（Jameson, 1984a, 65, 83-92）。在他的眼中，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的形塑中必須面對各種敘述的紛雜紊亂。原因是實相既是複雜、又不連貫，且具多面向，而解釋實相的主體（個人或團體）卻是雞零狗碎的（fragmented），也是人格分裂的（schizophrenic）（Jameson, 1988：351）。

無論如何，新理論必須同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分家，也應與哈伯馬斯的

批判理論割裂，因為任何道德化的批評在後現代的文化條件下都將面臨失效。詹明信呼籲理論家應該營構「認知的地圖」（cognitive maps），並且也應塑造一個新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詹明信的理念含有馬克思思想的線索。原因是他認為後現代社會的變遷，其主要的動力仍舊是階級與資本累積。他也主張應大力護衛社會主義的計畫。在此意義下，「後現代主義乃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他排斥文化自主的說法，卻主張把後現代主義等同為「超級的商品化」（hypercommodification）。

晚期資本主義是新馬理論家曼德爾（Ernest Mandel）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稱謂，目的在顯示經濟力量對當代西方社會宰制的厲害情形。詹明信借用曼氏這個名詞，而稍改其原義，也即不再強調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反覆申辯的勞動價值說，但仍舊以宏觀的角度討論社會經濟的結構對後現代生活產生何種形塑的作用。

不過，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法有異之處為：詹明信並不把文化的形成、政治經濟的結構和人類解放之可能性三者確定地加以掛鉤。這點與馬克思本人的政治信念是大異其趣的：蓋馬氏相信資本主義的特徵及趨勢必定產生普勞階級革命所需之文化空間。儘管他的理論無法印證歷史的發展，他仍舊把政治經濟有系統地聯繫到人類解放的可能性之上。與此適得其反，詹明信既不提供歷史發展的必然，也不提供規範性的應然這兩種理由，來支持他有關階級政治（政治經濟）同社會主義（人類的解放）發生密切關連底說法。

詹明信的理論無異把後現代的文化之各種條目和各種說詞也融入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說（holism視社會為下層建築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意識型態合構的整體或總體之說法）裡頭，從而使當代的思想又再度縮合於到馬克思的理論之中。不過他仍採取後現代主義否定理性的態度，以致他討論的深度似嫌不夠，也即無法像馬克思主義整體說一般交代文化、政治經濟和解放策略（社會主義的政治）三者之關連。詹明信毫無批判地把曼德爾的主張照單全收，他對馬克思的大敘述採取依違兩可的模稜態度，結果使他的文化批判或文化政治理論失去特色。換言之，他對後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這兩者的批評不夠充分，只能把兩者並列敘述，而未能如原先那樣雄心勃勃的計劃把這兩者做一批判性的整合（以上參考Antonio, 104-106.）。

## 七、結 論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半世紀歷史中，它經常面對著危機和崩潰的挑戰，就像上世紀末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一樣，本世紀90年代馬克思主義又遭逢衰微、乃至解體的危機。但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危機的爆發，並沒有置馬克思主義於死地。相反地，它卻像燒不死的鳳凰，從劫餘的灰燼重新騰飛翱翔。馬克思主義這種堅韌的生命力，這種驚人的自我更新之能力，這種置於死地而後生的本事，在人類的思想史上只有基督教、佛教、回教、儒家學說可以比美，都是經得起歷史與現實考驗的強勁之精神力量。<sup>9</sup>

儘管有蘇東波的變局、天安門的事件、西方新保守主義的抬頭和發展中國家的急起直追（尤其是東亞四條小龍的經濟成就），自1985年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由新馬發展為後馬，而顯示其理論演進的多元面貌。受著資本主義主流派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衝擊，後馬與後現代主義掛鉤，而逐漸改變其打高空、搞抽象、談解放的「大敘述」面目。

易言之，有異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強調物質的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生產方式與階級的形成）以及階級、階級敵視、階級鬥爭、階級解放，後馬的理論業已放棄這類總體說、或整體說（holism）的累贅，而致力於把馬克思的看法落實到現實生活的理解、批判與改造之上。

要之，後馬的理論展示下列各項特徵：

(一)取代勞動、階級、鬥爭、解放、社會主義這類總體說的概念是文化、知識、權力、異化這些與上層建築關連密切的「言說」（discourse）。原因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不是資產階級唯一可以主宰，而普勞階級完全無力對抗的時代。剛好相反，在這兩極的階級之外，尚有中產階級的崛起，也有各種宗教、種族、性別、利益結合的群體，競相爭取社會的權益。以致多元主義、民主和各種各樣的言說底浮現，都影響人們對自己、對社會、對世界、對歷史懷有不同的看法。不錯，社會仍舊充滿敵視與鬥爭，但這種敵視與鬥爭並非兩極化，而是多元化。

<sup>9</sup> 有關跨世紀馬克思主義傳統何去何從的問題，可以參考拙著1995d第2版第4章。

(二)馬克思對人類解放的願望，是一種總體的解放，也是解放的總體（*emancipatory totality*）。所謂的解放的總體是有下列幾種特徵，第一它涉及人類生產方面（物質）的進步等同於社會的進步，這是一種生產者（*productivist*）的觀點；第二，集中的權威可以有效處理經濟（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問題，這是一種跡近天真的樂觀想法；第三，人類的理性可以解決各項社會問題，這是缺乏批判，甚至非批判的看法；第四，普勞階級可以扮演改進社會與創造歷史的角色，這是把普勞階級視為團結一致、利害與共、同性質極高的社會群體；第五，歷史終因人類的解放而達致發展的高峰，這是黑格爾式「歷史終結」的信念。以上這些觀念構成了馬克思大敘述的內容，也是他解放的總體之構成因素。可是這些馬克思的論說在1985年之後一一遭到挑戰與質疑。後馬與後現代主義所作所為，剛好是要去掉馬克思解放的總體，達到卻除總體（*de-totalized*），去除普勞階級作為解放主體的「削除核心」（*de-centered*）之理論。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公然宣稱：「讓我們向總體宣戰吧！」（*Lyotard, 82*）

(三)在後馬的時期，馬克思本身的著作、理念逐漸喪失引人入勝的魅力。這並不意味著後馬理論家、或其他學人不再閱讀馬氏的作品，他們仍視馬克思的著作為理論發展的起點。不過只是起點而已，而非新馬或後馬的終點。與此相關的為馬克思及其後繼者（恩格斯、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列寧等）所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不再成為新馬或後馬主要引用的理論源泉（*Ritzer & Schubert, 370*）。反之，十九世紀以來，布爾喬亞思想界的經典人物如涂爾幹、韋伯、彌爾（穆勒），乃至二十世紀的佛洛伊德、索緒爾、米德諸人的學說，成為新馬與後馬理論的活頭泉水。在很大的程度內，後馬的理論便是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在批馬之餘，又進一步綜合和鑄鑄近代重大哲思與社會科學的成就，而變成大雜脣的新理論。

然則處在跨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應何去何從呢？根據布拉威（*Michael Burawoy*）所言，儘管蘇東波的變天顯示資本主義的勝利，但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敗亡。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成長史上充滿著不少的挫折、困頓、失敗。但「馬克思主義的成長正是依賴這些挫敗，把挫敗化成挑戰而激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成長……馬克思主義枝葉的繁茂繫於馬克思主義獨特的啓發式創見（*heuristics*）得以保留無遺，同時又能夠對各種改變作出適當的回應

」(Burawoy, 790)。所謂的改變，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的改變，也是指理論之外的社會變遷而言。

要之，如何結合馬克思主義人文的、批判的、解放的那個傳統（道德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科學的、實証的、經驗的另一個傳統（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進而與西方先進的哲思與精密的社會科學相輔相成，而發展出一套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應是世紀末理論家的職責。

### 參考書目

- Antonio, Robert J. 1990 "The Decline of the Grand Narrative of Emancipatory Modernity: Crisis or Renewal in Neo-Marxist Theory?" in George Ritzer (ed.), Frontiers of Soci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88-116.
- 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St. Louis: Telos Press.
-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1989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Sage.
-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Gino Raymond &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owles, Samuel and Herbert Gintis 1987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ov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rawoy, Michael 1990 "Marxism as Science: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775-793.

- Cohen, Gerald Allan 1972 “ Karl Marx and the Withering Away of Social Sciences ” ,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 No.2.
- 1978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8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 Themes from Marx,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990 “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Why Nozick Exercises Some Marxists More than He does any Egalitarian Liberals ” , in David Copp(ed.), Canadian Philosophers Celebrating Twenty Years of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Calgary, Albert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pp.363-387.
- Dymski, Gary A. 1991 “ Analytical Marxism ” , in Tom Bott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nd ed., pp.19-21. first ed. 1983.
- Elster, Jon 1985 Making Sense of Mar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Three Challenges to Class ” , in John Roemer(ed.), Analytic Marx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Further Thoughts on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 . in John Roemer(ed.), Analytic Marx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67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Mentor.
-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Sheridan Smith, London: Tavistock.
-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The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A.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 1975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rans. A.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Vintage.
- 1980 Power / Knowledge, trans.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 Geras, Norman 1977 “ Post Marxism ” , New Left Review, 163:40-82.
- 1978 “ 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 ” , New Left Review, 169:34-61.
- Habermas, Jü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trans. J. J.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 1976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 / a. M.: Suhrkamp.
-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Society.
- 1987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rick Lawrence, Boston: Beacon Press.
- Hobsbawm, Eric 1990 “ Goodbye to All That ” , Marxism Today, (Oct), pp. 18-23.
- Hung, Lien-te ( 洪鑣德 ) 1988 《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 台北：森大圖書有限公司，頁246。
- 1994 < 葛蘭西國家觀的析評 > , 與黃德怡合寫，刊《中山社會科學學報》, 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所，第8卷第2期，原定1994年夏季，卻於1995年6月出版，頁1—40。
- 1995a < 評介拉克勞和穆佛的後馬理論 > , 《美歐月刊》,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10卷第6期，頁98—117。
- 1995b < 卜地峨社會學理論之析評 > , 《社會學刊》,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第24期，1—34頁。
- 1995c < 符號學的馬克思主義之生成與發展 ——兼述從西馬到新馬到後馬的理論變化歷程 > , 《法政學報》, 淡水：私立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

系，第4期，頁41—58。

- 1995d 《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台北：森大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第二版。
- 1995e <馬克思主義在東歐——新馬與馬列主義的對抗>，《美歐月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10卷第11期，頁67—84。
- Jacoby, Russell 1980 “What is Conformist Marxism? ”, Telos, 45:19-43.
- 1987 The Las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 Jameson, Frede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 New Left Review, 146:53-92.
- 1984 “Periodizing the 60s.” in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Sohnya Sayres et. al.,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88 “Cognitive Mapping ”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Jones, Gareth Stedman 1990 “Marx After Marxism ”, Marxism Today, (Feb.)
- Laclau, Ernesto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 Popu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 1987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 New Left Review, 166: 79-106.
- Lyotard, Jean 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 Mouffe, Chantal 1993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 New York: Verso.



Mouffe, Chantal(ed.) 1979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tledge & Kegan Paul.

—1992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Ritzer, George and J. Daniel Schubert 1991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Neo-Marxist Theory: A Metatheoretical Analysis ” ,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4(3): 359-375.

Roemer, John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Free to Lose: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Philosophy, London: Radius.

Roemer, John(ed.) 1986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e, Robert 1989 “ How Marxism Is Analyzed: An Introduction ” , in Robert Ware and Kai Nielsen(eds.), Analyzing Marxism: New Essays on Marxism, Calgary, Alberta: The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Wood, Allen W. 1972 “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 ,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No.1.

—1981 Karl Marx, London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8 Marx Selec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Wood, Ellen Meiksins 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The New “ True ” Socialism, London: Verso.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5 Classes, London:Verso.

—1994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Essays on Class Analysis, Soci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 New York: Verso.

Wright, Erik Olin(ed.) 1989 The Debate on Class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Wright, Erik Olin, Andrew Levine & Elliot Sober 1992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本論文之撰述與成稿過程中獲台大三研所碩士班學生邱思慎和李世泉的大力協助,特此申謝。